

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部诗集《恢复》*

孙 党 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旬,郭沫若在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并经历了失败和危难之后,经香港潜回了上海。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国民党反动派正悬赏缉拿他,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决定让他们全家去苏联。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即将登程的时候,郭沫若却突然患了一场重病,在医院整整住了三个多星期,直到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才出院。

大病初愈,郭沫若感到一种新生的欢悦。尽管他的身体还很虚弱,刚出院的十几天里整天都躺在床上,但他胸中的革命激情却如同浩淼的大海奔腾不息,他追念战斗的过往,憧憬美好的未来,并发而为诗,诗集《恢复》就是在这时写成的。作者后来回忆说:

在恢复期中,……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象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我躺在床上,把一册抄本放在枕下,一有诗兴,立即拿着一枝铅笔来纪录,公然也就录成了一个集子。那便是曾经出版而且遭过禁止的《恢复》了。象那样受着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我生平只有过三次。一次是五四前后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些作品的产生,一次是写《瓶》的时候,再一次便是这《恢复》的写出了。但这写《恢复》时比前两次是更加清醒的。①

这就说明:诗人胸中不断喷涌的诗兴,是“从外边侵袭来的”,或者说,是时代的狂涛巨浪激发了他的无限诗情;同时,诗人对这一次

的创作激情特别珍视,不仅认为它和创作《女神》时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相似,而且觉得它比前两次认识“更加清醒”,即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认识更加明确。应该说,诗人的自述是真实可信的。

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从前一年开始的大屠杀还在继续,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正处在极度黑暗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多次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诗人亲身参加了这场大革命,和革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敌人的凶残与卑劣激起他无比的愤恨,战友们的英勇牺牲令他无限悲痛和钦敬,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给他增添了战斗的信心和力量。诗人把自己强烈的爱和恨、热情和希望,全部倾注在《恢复》的诗篇中。因此,《恢复》中的二十四首诗虽然写在最黑暗最艰难的境况下,但它们却充满革命的乐观的精神,展示了诗人热忱、坚贞而崇高的革命品格,具有一股激动人心的力量。

时穷节乃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诗人的精神无比坚定:

我的头颅就算被人锯下又有甚么?
世间上决没有两面都可套弦的弯弓。

* 本文为《郭沫若评传》第六章第三节。

他宁死不屈，决心“保持态度的彻底，意志的通红”。诗人是从战争和大病的严峻考验中走过来的，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实在已超过了不少的死线，我将以天地为槨，以人类为棺。”^②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是一个革命者最可宝贵的品格。有了它，才能保持“通红”的意志，才能临危不惧，和敌人斗争到底。在《如火如荼的恐怖》中，诗人满怀豪情地写道：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这里的“白色”象征敌人的残暴统治，“如火如荼的恐怖”象征革命的暴力，孙悟空的广大神通则象征人民力量的不可征服。诗篇形象地说明：白色恐怖丝毫阻挡不了革命者前进的步伐，血腥屠杀只能唤起广大人民的迅速觉醒，人民群众必将用“如火如荼”的革命暴力去反抗敌人的残暴统治。在那“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岁月里，能够如此蔑视敌人的威压，英勇无畏，誓与敌人血战到底，这是多么坚毅的精神，多么顽强的斗志！它不仅表现了诗人坚强不屈的铮铮铁骨，而且反映了革命群众英勇战斗前仆后继的时代精神。这是诗集《恢复》中最具光焰的思想，是它的灵魂，也是诗人世界观实现了质的飞跃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女神》中，特别是那些写在“五四”高潮中的诗篇里，展现了诗人强烈的反抗热情和美好理想；但是，当诗人一旦目睹了现实的黑暗腐败景象以后，诗篇中就立即流露出失望、幻灭以至消极悲观的情绪，而今，诗人所面临的敌人极端凶残，困难和危险远比

那时严重，但在他的诗篇中却表现出无比坚定昂扬的斗志，对前途的无限信心。这原因，就是由于诗人在写作《恢复》的时候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敌人的本质，对革命的力量和道路，对整个现实，都有了清醒的认识。

请看，《血的幻影》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血的图画：“周围是一片望不透的黑暗”，中间好象“一座铁牢”。曾经在天际飞动的“一朵红云”，现已化成“一片血雨”，连同它的“驾御”者——“火焰天使”，一齐“落到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之渊。”此刻，一群吸血的“恶魔”在跳舞狞笑，而“无数的火焰天使”却变成“血影模糊”。这图景不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现实的反映么！人们从画面上简直可以闻到一股血腥气。同时，诗人还透过画面告诉我们：这群“恶魔”虽然也有人的“方趾圆颅”的外形，却怀着“猛兽”的凶残心肠；对付这群凶恶的敌人，只能针锋相对。

对于猛兽哪里还容得着片刻的容忍，
我们快举起我们的炬火烧灭山林！
把我们一切的耻辱、因循、怀疑、苦闷……
投向大火中，不然，我们是永远不能再生！

很清楚，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向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只有经过血与火的大搏斗，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而获得“再生”；否则，就只能永远陷入“黑暗之渊”。诗人从血的教训中揭示出的这一真理，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教育和鼓动作用。

《怀亡友》一诗是怀念革命先烈、诗人的好友孙炳文的^③，同时也寄托着对所有为革命牺牲的“勇敢的同伴”的悼念。这首诗语言平实质朴，感情真挚深沉，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具有明显的特色。诗中虽然没有豪壮的誓言，惊人的场景，而且诗人仿佛是在和亡友促膝对谈一般，诉述着他们两人亲如手足的情谊，友人在革命胜利时的欢悦、失败

时的遇害；但是却把亡友待人真诚、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光辉形象，血肉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于平静的倾诉之中，表现了诗人对亡友诚挚的敬爱和悼念。

啊，朋友，你的头颅是老早被人锯了，
一直到现在不知道你被抛在了哪边。
不过你那口吃的声音还在和我说笑，
你那赤铜色的面孔好象还在面前。

这看似甚平朴的诗句，却凝聚着强烈深挚的爱和恨，十分形象感人。如此可亲可敬的战友竟被敌人杀害了，而且连尸骨都不知抛在何处，我们面对的敌人该是多么凶残和卑劣！然而烈士的英灵不死，他那亲切的音容笑貌、崇高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并激励人们去进行战斗。由于洞悉敌人的反动本质，又受到先烈精神的鼓舞，所以诗人虽已看到革命遭了失败，“血染了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但他毫不悲观，“相信我们是操着最后的胜算。”

诗人对未来所怀抱的必胜信念，决不是出于单纯的革命热情，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革命力量和革命道路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诗人笔下，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广大人民都处在“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悲惨境地；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在我们的头上跳梁，他们的经济侵略吸尽了我们的血浆”，“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对人民实行如同秦始皇一般的残暴统治，新旧军阀屠杀革命群众的鲜血已经将长江和黄河的流水“染得更红”。这就形象地说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同时，诗人从“农民暴动的前驱”陈涉、吴广“揭竿”反秦的历史经验中，更从他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实际体验中，认识到工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具有旋乾转坤的力量。“三万万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民”，“五百万众的新兴的产业工人”，“这是一个最猛烈、最危险、最庞大的

炸弹，它的爆发会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④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更使诗人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他坚信“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⑤为了战胜敌人，诗人还提出“应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联盟”。诗集《恢复》中所表现出的这些思想，无疑都是正确的，是同党和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思想路线基本上一致的。因此，尽管当时革命还处在低潮之中，长夜漫漫，乌云密布，但诗人却信心百倍地预言：“这是暴风雨快要来时的先兆”，“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同时，他也深深懂得，通往胜利的道路是艰难曲折、充满战斗的，诗人准备献出自己的一腔热血：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风雨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⑥

诗人是抱定为祖国为群众的新生解放而献身的决心的，但残酷的现实又逼使他将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异邦，这自然引起了他内心的忧烦和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峨眉山上的白雪》和《巫峡的回忆》正表现了诗人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但是，这两首诗并不是一般的思乡之作，而是在深情怀念和赞美故乡奇丽风光的艺术氛围中，抒发了诗人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离愁别恨，和面临危难决心坚持斗争的精神，真切感人。

除了上面已经分析和指出的以外，在《恢复》中，还表现了诗人对于吃人的资本势力的血泪控诉，^⑦对于国民党新军阀的极端痛恨与蔑视，^⑧对于在白色恐怖下举行罢工斗争的工人的热情赞颂和对于夺取“最后的胜利”的坚强信心。^⑨

总之，整个《恢复》所表现的思想情感是革命的健康的，它唱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

家在革命遭受挫折时的心声，印下了诗人思想发展的足迹。

随着诗人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他的艺术观点、艺术趣味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他这时写的文艺论文反映了这种变化外，在《恢复》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及其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总是带有一定的阶级性，然而一切剥削阶级又总是隐瞒或否认文艺的这一特性，只有无产阶级才敢于公开承认它。郭沫若的《诗的宣言》就明白宣告：

我是诗，这便是我的宣言，
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
不过我觉得还软弱了一点，
我应该要经过爆裂一番。

在这里，诗人公开承认自己诗歌的无产阶级性质，或者说表现了他创作无产阶级诗歌的强烈而真诚的愿望。我们知道，当诗人的思想开始转变的时候，他就告别了“低回的情趣”和“虚无的幻美”，将目光从自然景物中转向“水平线下”的社会生活；如今，在诗人经历了大革命的艰苦考验以后，他更没有那种“超然的情绪”与“幽静的心弦”去赏玩“苍白”的月光，他所全神贯注的则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工人农民的困苦生活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因此，诗人坚定地表示：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什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高歌。
我要歌出我们颓废的邦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⑩

从赞美星星月亮到歌唱“无产阶级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它反映了诗人政治和艺术思想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转变也是许多小资产阶级诗人转向革命的共同特点。比如，杰出的革命诗人何其芳在谈到自己艺术思想的转变时就曾说过：

我曾经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中那个说着“我爱云，我爱那飘忽的云”的远方人，但后来由于看见了农村和都市的不平，看见了农民的不爱土地，我却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亮，
也不爱星星。⑪

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就不爱星云，不能描写自然景物；但是，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年代里，歌出无产阶级的生活，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却应该是无产阶级诗歌的主要任务。

为了更好地表现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郭沫若还注意探索诗歌的新形式。从他在《恢复》中所表露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形式应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真率”。他认为新的诗歌如同赤脚裸体的工人农民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修饰”，而“绫罗、香水、宝石”这一类修饰品，则属于“富有的阶级”。⑫二是“狂暴”，也就是英雄的格调。他说：“我所希望的是狂暴的音乐，犹如鞀鞀的鼙鼓声浪喧天，或者如那浩茫的大海轰隆隆地鼓浪而前，打在那万仞的岩头，撼地的声音随水花飞溅。”⑬很明显，这里所说的“真率”，并不是直率或粗率，而是指作品的情真、景真，能质朴地表现出革命者的真情实感；“狂暴”也不是狂乱与粗暴，而是要求诗歌具有急促的节奏、激越的旋律和雄壮的格调。应该说，当阶级斗争白热化、资产阶级晦涩颓靡的诗歌又在流行的时候，郭沫若提倡这种“真率”和“狂暴”的诗风，是有利于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增强诗歌的战斗作用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自然，质朴真率和激越雄壮并不是无产阶级诗歌所独有的特点，如果片面地加以强调，甚至还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平。但是，郭沫若在《恢复》中所表现出的努力探索新的艺术形式的精神及其取得的实际成果，则显示了他的艺术思想、艺术趣味的明

显变化，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和《女神》、《前茅》相比，《恢复》在艺术上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有着明显的新的创造发展。它的主要特点仍然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但由于诗人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际，对社会状况及其发展前途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这种浪漫主义便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的土壤里，同现实有了更紧密的结合。诗人的革命激情和光辉理想，不是用热烈的呼喊或借助古代英雄、神话传说来表现，而是把它们熔铸在那些描述恢复期间自身感受的诗篇中。这样，《恢复》中的诗篇既不是单纯的主观情感的抒发，也不是纯客观的现实描写，往往于朴实的描述中见真情，主观的情感在貌似平静的描述中燃烧。所以，从整个诗集来看，尽管有少数诗篇过于质直和散文化；但多数诗篇、特别是前面分析过的几篇却都形象朴实，真切感人，并表现出一种雄浑而深沉的新的艺术风格。毫无疑问，当“新月派”消极颓废的诗歌正在泛滥，无产阶级诗歌刚开始产生的时候，诗集《恢复》的出现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以其深刻的革命内容和刚健雄浑的诗风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喜爱，给他们以教育和鼓舞，而且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这部诗集的评价并不是一致的。一般说来，解放以后的著述对它都比较重视，评价也相当高，但在三十年代则存在着贬抑的倾向。比如，蒲风就曾说《恢复》对于“农民工人怎样地忍饥耐冻、怎样地开展了时代的怒吼”，“几乎没有理会到，有，那只是抽象的，观念的呐喊。”^⑭至于郭沫若自己，从他写诗当时的日记看，他是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恢复》的出版的。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对这部诗集的看法却发生了变化。他说：“《恢复》也没有多大价值，是革命顿挫，且在我个人大病后，在卧榻上不能睡着因而流出来的东西。全部不免有浓厚的感伤情趣。”而且“旧

有的手法等等尚未能十分清算”^⑮。又说：“恢复”“里面也还有些可读的诗，但嫌气魄不雄厚，而有时更带着浓重的悲抑气味。”^⑯应该说，上述评价，包括诗人自己的评价在内，都是不公平的。而且诗人自己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也不全是出于自谦，而是由于他这时对诗歌创作的认识与态度有了改变。他曾公开地说：“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要充分地写出些为高雅文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⑰这实在是一种过激之论。虽说诗人的本意是在反击那些攻击革命诗歌的论调，强调诗歌的战斗性，但无产阶级诗歌毕竟和“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是完全不同的。既然诗人对诗歌抱着如此过激的看法，那么他对表现了个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与愤懑的《恢复》自然就要有所不满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能不能表现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不可以反映革命斗争的失败及革命者个人的痛苦与悲愤？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诗贵情真。就是要反映诗人自己在生活、现实中的真切感受，也就是清人邵梅臣所说的：“诗中须有我”^⑱。这个“我”，并不是主观的“自我扩张”，而是指那富有个性的真实感情。没有真情实感的诗，决不是好诗，也不能打动人。同时，如果诗人自己的感情不和人民大众的忧乐相一致，不能从中照见时代的精神，那么，即使是反映了个人真实情感的诗，也是没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实践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充溢着追求光明、新生与个性解放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而诗人的这种内发情感既是在“五四”狂潮激荡下爆发出来的，又是和五四时期人民群众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争取新生与解放的要求一致的，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因而

这部诗集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和重大的社会意义。

爱情诗集《瓶》描述了诗人个人生活的一段插曲，可说是情真意绵，低回往复，确曾牵动过不少青年读者的心；但是，诗中流露出的失意、感伤的情绪却和“五卅”前夕人民群众日趋高涨的革命精神不协调，因而这部诗集的社会历史意义，就远远不如《女神》那样重大。

诗集《恢复》反映了诗人在大难和大病后开始恢复时的真实情感，其中有因革命失败和个人患病的痛苦，也有大病复愈的喜悦；有对敌人的憎恨与蔑视，又有对亡友的悼念和对人民的敬爱；有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更有战胜敌人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当诗人写作《恢复》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遭到严重失败以后党继续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这是诗人健康的恢复期，也是整个革命斗争的“恢复”期。那时，时代赋予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是：迅速恢复和壮大革命的力量，坚持武装斗争，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诗人在《恢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坚贞不屈、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精神，正反映了阶级和时代的要求。它表明：诗人和阶级、时代的血脉相通，呼吸与共，个人的情感同革命的要求完全一致。这样，诗中表现的个人情感愈真实愈丰富，反映的时代精神便愈深刻，也就愈能打动读者的心，愈具有历史意义。可以说，《恢复》这部诗集的重要价值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因为它反映了诗人个人的情感，反映了他在革命失败后的忧苦和对亡友的哀悼，就认为它的情调感伤，价值不大。其实，因革命失败、战友牺牲而感到痛苦和悲愤是十分自然的，正表现了诗人对革命、对战友的深情。同时，我们更不能因为诗集表现出对敌人的蔑视，对未来的必胜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就妄断诗人没有认识当时革命潮流低落的形势和斗争的长期性

艰苦性，是受了左倾思潮的影响。这种论断的错误显然是由于忽略了诗歌的特点，用分析理论文章的办法来分析诗歌，自然要歪曲作品的思想内容。因此，我们在分析《恢复》的时候，不能抓住其中的片语只言就匆忙作出结论，而必须注意诗歌的特点，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总的倾向进行剖析。

总之，尽管《恢复》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有一定的缺点，但从总的倾向来看，它无疑是一部无产阶级的诗集，而且按出版时间的先后来说，它又是中国第一部无产阶级的诗集，而它的作者郭沫若也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歌手。

① 《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94页。

② 《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34页。

③ 孙炳文，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曾任孙中山的警卫长，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留守部主任。1927年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他是郭沫若参加北伐军的直接鼓动者。郭沫若在《纪念邓择生先生》一文中说：“后来我率性参加政治部，主要也是出于炳文兄的怂恿。”《怀亡友》诗中也有这样两句：“那时候是你劝我参加实际的行动，我兴高彩烈地随大军北伐中原。”

④ 《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57页。

⑤ 《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54页。

⑥ 《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81页。

⑦ 参见《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77—378页。

⑧ 参见《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58页。

⑨ 参见《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75页。

⑩ 《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36页。

⑪ 何其芳：《夜歌后记一》，《夜歌》（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年1月初版）第316页。

⑫ 《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49页。

⑬ 《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50页。

⑭ 蒲风：《论郭沫若的诗》，载1937年11月出版的《中国诗坛》第1卷第4期。

⑮ 《郭沫若诗作谈》（蒲风访问整理），载1936年8月16日出版的《现世界》半月刊创刊号。

⑯⑰ 《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第148页。

⑱ 邵梅臣：《画耕偶录·论画》。